知识管理论坛 ISSN 2095-5472 CN11-6036/C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um

E-mail: kmf@mail.las.ac.cn
http://www.kmf.ac.cn

【学术探索】

基于藏书印记信息的特藏信息挖掘初探：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

◎ 李彦霖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433

摘要：[目的 / 意义] 借鉴书画、古籍的做法，利用中国特有的鉴藏章文化追溯中文特藏单册流传的历史信息，重建特藏馆藏流传历史。[方法 / 过程] 除介绍复旦大学图书馆现行单册鉴藏章、馆藏书籍签章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利用的案例外，针对解决无档案记载可寻的印章进行数据挖掘尝试。[结果 / 结论] 经小样本收集数据分析实验，论证该方法的可行性，明确所需元数据字段，制定大规模回溯需要使用的编目细则初步方案。

关键词：特藏建设；回溯；鉴藏章；馆藏章；数据分析
分类号：G254.343

引用格式：李彦霖 . 基于藏书印记信息的特藏信息挖掘初探：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 [J/OL]. 知识管理论坛 , 2019, 4(4): 232-245[引用日期]. http://www.kmf.ac.cn/p/182/.

1 背景与意义

参考国外业界的界定和分级，图书馆馆藏根据其自身价值可以大致分为五级：①第一级即不再适合流通的旧书；②第二级是具有一定保留价值的旧书；③从第三级开始注重书本身信息价值以外的价值，如特别的作者、特定的时代、特殊的装帧与印刷等；④第四级则是符合各馆独特的收藏特色和定位的书籍，如服务人群的研究倾向、固有特藏的扩充；⑤第五级被称作镇馆之宝（the library’s collections of record），但凡有学者需要进行相关研究都必须参考的馆藏。由以上定义可知，二级以上的馆藏，都需要馆员去挖掘每本书除了出版时自带的内容信息以外的价值[1]。

而对于诸多图书馆来说，对非古籍类特藏的信息揭示基本与普通馆藏无异，甚至由于这些特藏相较于新书年代更为久远，在原有编目信息中，所著录内容甚至比普通图书更为简略，无论是单册的来源、状态、外表、纸张、印刷、扉页是否有题注、是否有原主的藏书章或藏书票等珍贵的历史信息，数据均缺失，无法将特藏图书信息全面揭示，也即未能将第三级及之后的馆藏价值予以挖掘，明珠蒙尘着实可惜。

笔者将聚焦反映特藏图书流转信息的藏书印记数据，通过对印章数据的挖掘，发掘印章

作者简介：李彦霖（ORICD: 0000-0001-7408-9907），助理馆员，硕士，E-mail: li_yanlin@fudan.edu.cn。
收稿日期：2019-03-18 发表日期：2019-08-19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知识管理论坛，2019(4):232-245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25

背后的故事，还原特藏图书的收藏历史，进而为评估其价值奠定基础。

2 进行馆藏印章信息挖掘的可行性

馆藏章是一种特殊的鉴藏章，鉴藏章的价值在古籍字画领域被广泛认可，馆藏章同理也可用作特藏回溯流传历史、评估价值的依据。

我国鉴藏印的传统始于隋唐，时人鉴定书法真迹后在所鉴定字迹或副页上签章，以示负责，相较于其他章具有独特的传统和功能[2]。在西方也有在所收藏的书籍上贴上藏书票的传统，藏书票的历史始于15世纪，远没有我国藏书章的历史悠久，但做工精美、寓意丰富的藏书票也有“版画珍珠”“纸上宝石”等美称。这些二次创作出现在批量印刷的书籍上，使每一册书变成独一无二的存在[3]。对古籍而言，整理研究藏书章工作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认可，且古籍上的藏书章可以参照书画鉴赏章的研究方法记录整理，用于鉴别古籍的刻板年代、了解古籍的收藏和流传过程、了解藏书者以及丰富馆藏等图书馆学的研究[4]。针对非古籍类特藏，虽然也有关于藏书印记的研究，却并未得到相同程度的重视，一方面图书馆的馆藏章因其机构性质往往设计庄重保守，以容易辨识的楷体或古朴端正的大篆为主流，相较其他鉴藏章艺术价值不高；另一方面，这部分馆藏多是近百年出版收藏的，早期制度虽然并不完备，但还是有丰富的档案资料留存，对于单册书籍来源和流传过程的研究来说，相较馆藏章，查询档案更方便快捷。但这并不代表馆藏章完全没有研究价值，就如同存世官印对考辨古官职印制的价值更多用于考证礼坏乐崩，无法通过文献考证的两周时期[5]，特藏中的馆藏章对于近代史的研究也有其价值和意义。

3 特藏信息挖掘

就目前国内图书馆，特别是有一定创办历史的高校图书馆来说，早期馆藏经历了数次动荡，在特藏类信息的揭示上存在一些缺失，有如下几种类型：

（1）早期登录簿记载信息缺失。早期档案记载用词暧昧、不规范，常常无法提供准确的数据，计算标准时常变化，又多有缺失。

（2）捐赠书籍的登记信息缺失。系统中之前很少有关于藏书来源的记载，即使有具体捐赠书目的情况下，现在要重新找回已经按照索书号上架的书，很多时候也只能靠签章判断；无捐赠书目的更是只能在茫茫书海中逐本翻看有无签章来寻找；有些有记录的书，找不到了；反之也有些书从书架上拿下来却找不到记录的存在。

（3）战争、动乱所造成的馆藏遗失及信息缺失。由于百年间的数次战争、动乱，以及工作人员不足、工作量太大而没有余力详细著录等原因，现在很多书籍的来源单靠现存的编目记录和登录簿并不可考。

（4）院系调整馆藏调拨导致信息揭示不完整甚至记录缺失。

（5）卡片目录转换为自动化系统后回溯编目数据简化。

4 藏书印记在特藏信息挖掘中的应用

4.1 通过藏书印记研究单本书籍流转历史

研究整理鉴赏章，可以用于鉴别书籍的年代、了解书籍的收藏和流传过程、了解藏书者以及丰富馆藏等图书馆学的研究[5]。包括藏书章、藏书票、财产号、借阅信息等在内的流传印记在特藏建设中作为重要依据在很多高校图书馆都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如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整理西南联大文献时的依据便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印章[6]，兰州大学图书馆[7]和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8]也利用相似研究方法对自身的馆史进行研究。

然而在诸多利用馆藏章研究单本流传历史的案例中，现有研究方法过分依赖研究者对单个章来历的了解，缺乏单册上多个印记间相互印证等考证步骤，或利用单册信息反推印章来历的研究。而对有一定创办历史的高校图书馆来说，特藏馆藏中出现的很多章是没有可供研究者



利用的档案文件来了解其来历的，现有资料中又多有缺失或模糊等造成的不够可信的部分需要多个印记相互佐证来达到信息挖掘的目的。

通过整理书籍上的印章手记等信息来建立数据库，考证印章来历，重建起流传历史记录，可以帮助梳理馆藏来源的脉络，窥见更多书籍经历过的故事。

4.2 通过藏书印记发现馆藏价值

通过数次调拨，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藏书中现存有大量民国时期并且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学校、机构馆藏章、公章，如大夏大学、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又如各级中小学、简易师范学校、国民政府陆军等（见表 1），这些学校和机构的档案已经不易找到，他们的历史也已经不会再延续，关于他们的史料每一个都是珍贵的，他们的藏书又和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息息相关，这些外来书籍上的印记（如残留的章、手记、登录号甚至借书卡等）经过回溯整理后将能成为民国时期教育体系的重要研究资源。

表 1 部分特藏部现存校外馆藏章

序号	馆藏章	释文
1		大夏大学史地社会学研究室
2		震旦大学图书馆藏
3		复旦大夏第二联合大学图书馆
4		国立安徽大学图书馆藏书
5		大夏大学圖藏书之章

4.3 通过藏书印记汇集信息还原馆藏发展史

馆藏章的服役年代很多时候并无档案可寻，但通过多本馆藏的比对分析可以大概率恢复这个记录。很多馆藏上的印章除了图书馆印章外，还包括全校回溯编目汇集的各个院系、部、组资料室印章，虽然各院系资料室、图书室也可以通过调阅相关档案来判断馆藏来源，但如果档案缺失则无法进行馆藏发展历史的追踪。在这种情况下，借助藏书印记的汇集数据，通过整理书籍相关信息来推测书籍印章的年代、来历，可以还原整个馆藏发展的历史。

5 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书籍印章数据挖掘的实践

复旦大学图书馆建成已有百年，其中从 1918 年同学发起戊午阅书社到 1953 年藏书建设转以订购为主这 35 年间，藏书来源多为捐赠或从他校调拨而来。根据档案数据计算的图书馆馆藏册数年平均增长率见图 1，1924 年到 1979 年间，每一次馆藏数量的爆发性增长都能对应上馆史中的一段关于捐献或调拨的记载，例如：1925 年“刘大白寄存图书二〇〇〇册，杜定友寄存图书八〇〇册”；1928 年“文科阅书室近得谢六逸移赠书籍二〇〇册，并获其长期赠送《新女性》《语丝》《文学周刊》杂志”；1930 年 1 月“建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教授洪深、余楠秋、李权时、蔡尚思等捐赠名著一千数百册”……又有战后接收伪上海大学藏书，解放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先后接收校外调入图书 55 万余册[9]。这些书在被捐或调入复旦图书馆前，可能本来就是二手书，也可能是某位校友赠给恩师的大作。每一本书背后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而故事需要馆员整理其痕迹以发掘。

知识管理论坛，2019(4):232–245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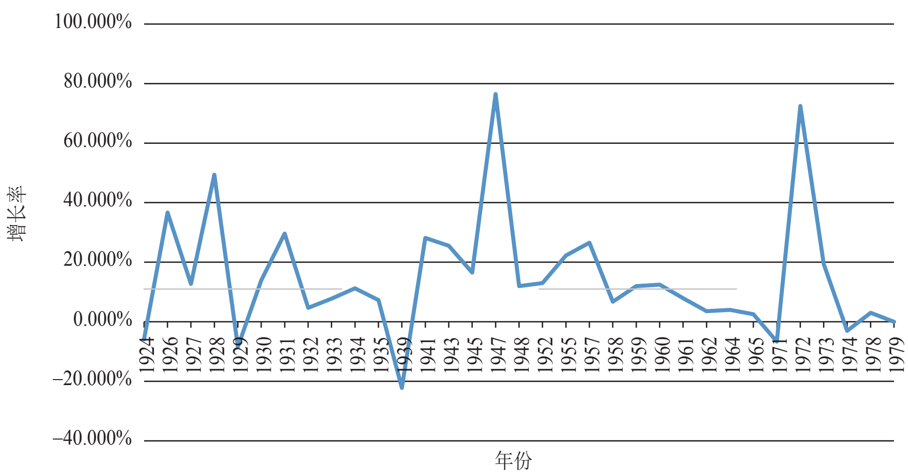


图 1　1924–1979 年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图书册数年均增长率

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为例（见图 2），封面右上角写有索书号，封底缺失，现存部分没有任何馆藏章或私章、登录号等信息，左上角的小楷留言字体风格和封面题字一致但在别的副本上没有出现过，是否为梁启超亲笔，现在几乎无从考证。

综上所述，目前的特藏信息揭示的元数据量远没有达到特藏所需要求，无法满足特藏读者的检索需求，其馆藏的价值仍处于待发掘状态。为此，笔者与所在团队对非线装特藏书籍进行全面的数据采集，并基于印章数据进行系统性的价值挖掘。

5.1　样本

初期样本为复旦大学图书馆 10 余万册民国书籍中的 3 万册，对这 3 万册书籍的藏书印章进行初步整理。在实际的整理过程中，整理和收集的范围又拓展出了历史人物手记一项，但事实上本研究所遇到的有趣但不在此次整理范围之内的小印记不知凡几。今后将以特藏印章为切入点，逐步完整揭示特藏信息，使这些珍贵宝藏的价值能为人所知，为人所用。

在目前已经整理的 3 万册左右书籍中，共找到不重复签章 550 个，其中各种机构印章 428 个，个人或机构的藏书章、捐赠签章 363 个，暂时无从考证的姓名章、闲章近百。本次对书章的分析研究主要针对复旦相关的签章馆藏章，目前找到的复旦相关的不重复签章共有 117 个，其中馆藏章 71 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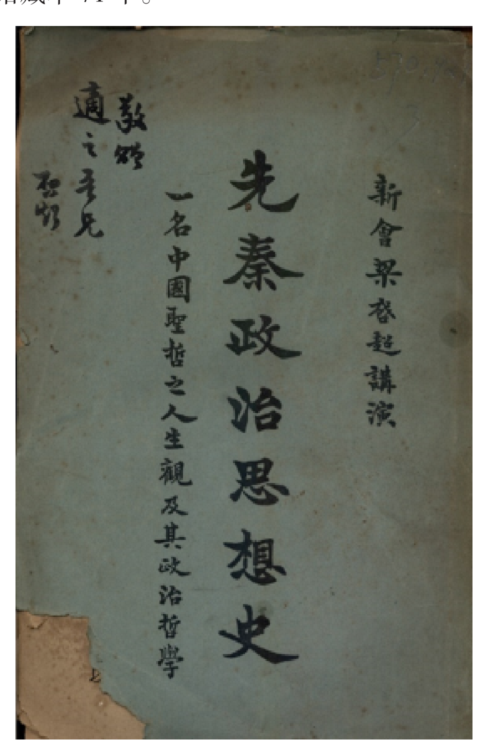


图 2　《先秦政治思想史》封面

5.2　整理和挖掘印章信息存在的困难

虽然馆藏章从建馆之初至今一直在被使用，但是从来没有被存档过，因此整理本馆的签章存在很多困难。



（1）捐赠、调拨等非购买来源图书的障碍。由于民国书中捐赠和调入书占比很大，这些二手书的入藏时间和出版年份关系不是很大，可查的登录簿中存档的入藏时间也可能和馆藏章的加盖日期存在一定错位，而在入藏之后的数次清点中也会用印，任何独立的信息在这次工作当中都不足以独立成为可信的依据。如此一来，每个馆藏章的大致服役时间范围的判定推理大多从章自身文本信息入手，然后通过多个其他信息互相佐证，最终判定。可以预见，等到特藏馆藏章数据库建立之后，通过统计计算大数据的结果可能会推翻很多本研究目前的结论，可是现在又不能一步到位建立一个数据库，只能尽可能整理出一份特藏部的印谱。

（2）印章信息甄别的准确率问题。首先，如之前本研究所遇到的问题，在没有一个印谱参考的情况下，多个人分头同时整理会出现大量重复，又会因为"很像""见过"等主观的感觉而出现遗漏 (如多枚设计相似的"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印，见表 2)，还有因为篆体字难认，导致同一个章两个人登记成了两个等诸多问题。虽然本团队现在只是粗略整理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书籍的冰山一角，但初步建立一个较完整的印谱让工作得以标准化，再在之后的回溯工作中查缺补漏，在目前看来是最好的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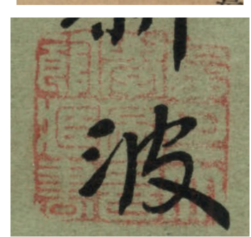
5.3 藏书印记信息挖掘案例

5.3.1 通过馆藏章研究书籍流传历史案例

复旦大学图书馆 1953 年以前的馆藏来源多为捐赠，著名教授们更是多次捐书，可以透过书上的印章、手记等看到很多有趣的故事，补全一些没有记录的历史 [9]。以下为各种应用的典型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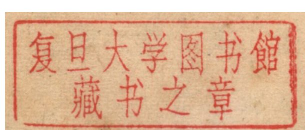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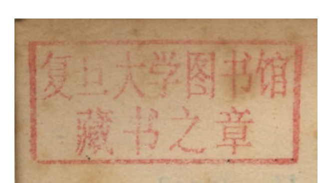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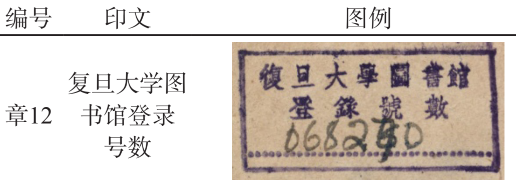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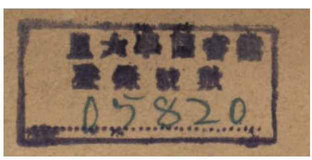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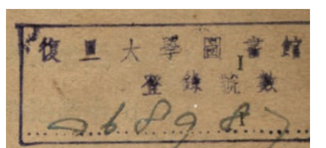
（1）甄别同一捐赠人的多次捐赠。例如，陈望道校长所捐的 4 本书，其中两本扉页盖有三枚章（见图 3- 图 6）：一枚 2.7 厘米的大篆朱文方印"望道藏书"，一枚 1.3*6.6cm 九叠篆朱文长方印"陈望道校长赠"和一枚 4.1*1.5 朱文简繁混杂的楷体字朱文长方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之章"，查询登录号确定入藏时间为 1974-1979 年之间，应为 1977 年 12 月，在陈望道校长去世后家人捐赠的其全部藏书中的两本，可以用于补全 MARC 记录捐赠信息。另外还有两本 40 年代出版的书，登录号分别为 279310 和 269059，并没有上述两枚陈望道校长的印，但一本上有手写的"陈望道先生赠书"（见图 5），另一本上有著者赠言"望道教务长道正"并落款和私印（见图 7），这两个登录号都属于 1955 年的登录簿，这一年复旦大学图书馆曾经清理编目 30 万册书，但是查阅现有陈望道校长的多次捐书档案却没有 20 世纪 40 年代到 1955 年间的捐书记录。虽然不能判定这两本书的具体年份，但是可以为陈校长已经非常长的捐赠记录略作补充。

表 2 复旦大学图书馆部分馆藏章

编号	印文	图例
章1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	
章2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	
章3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章4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知识管理论坛，2019(4):232–245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25

（续表2）

编号	印文	图例
章5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章6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	
章7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之章	
章8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章9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之章	
章10	复旦图书馆	
章11	复旦大学圕	
章12	复旦大学图书馆登录号数	
章13	复旦大学图书馆登录号数	
章14	旦大学图书馆登录号数	
章15	复旦大学图书馆登录号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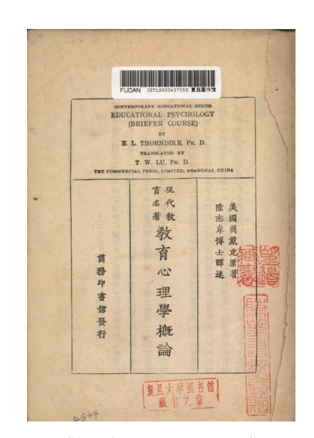


图 3 《教育心理学概论》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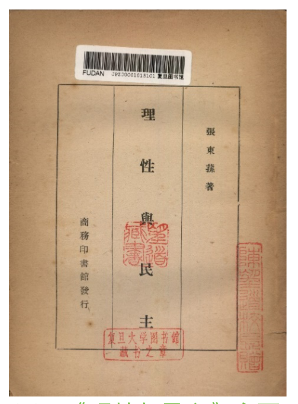


图 4 《理性与民主》扉页



知识管理论坛
2019 年 第 4 期(总第 22 期)



图 5《论学习问题》扉页



图 6《中国社会简史》扉页

（2）判断捐赠时间

《社会进化论》封二右上角有“孙寒冰先生藏书”楷体章一枚（见图 7），又有“孙氏图书馆登录号数”并手写登录号“1387”和“国立复旦大学图书馆登录号数”并手写登录号“027216”各一枚，再有“注意·借供参考 务惜爱护”楷体章一枚（见图 8）。一开始本团队推断，此书最初为孙寒冰先生为自己家族的“孙氏图书馆”藏书所购，为家族共有，后来在“国立复旦大学”时期，也就是 1942 年春到 1949 年秋期间入藏复旦图书馆[10]。但查询登录号记载，020001-030000 是在民国 27 年也就是 1938 年入藏。1938 年复旦大学因为抗战爆发刚迁至重庆，一同迁至重庆的书籍却只有五分之一，于是在当年 12 月 23 日到 29 日展开了“献书运动”，次年 1 月又有“献书周”活动，师生捐书 3 000 余册[9]。据此推理，孙先生在献书运动中再次带头献书时捐出此书，但直到 1945 年清点馆藏回迁上海时才盖上了登录号印章并写上登录号。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这本书是在之前的数次捐书活动中捐出，到了 1938 年迁至北培时因为种种原因又重新分配过登录号数，因为光看民国 27 年的登录簿，有从 01001-050000 这么多书，而随迁图书总共只有 12 593 册，显然这时可能是为了迁校，有很大一部分藏书被重新清册并分配了登录号。希望在今后的整理工作中能收集到更多的数据和信息来确认这本书的入藏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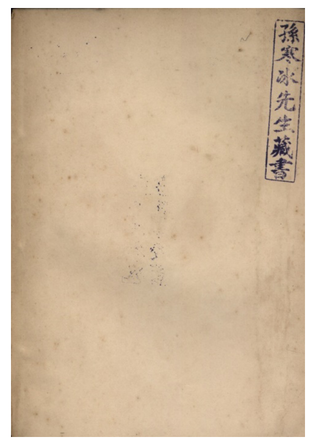


图 7《社会进化论》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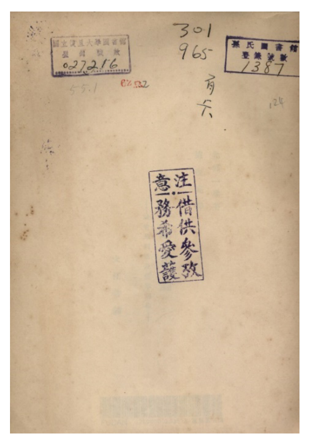


图 8《社会进化论》扉页

知识管理论坛，2019(4):232-245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25

关于在北碚的这段历史，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有 4 本书（见图 9- 图 13），同无法考证陈望道校长具体捐献年份的两本书一样，这 4 本书的出版时间为 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初，登录号记录为 1955 年，其中 3 本加盖有楷体繁体字，长方形 4*2.8m 印“国立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馆图书室图书登记”并写有登录号，这 3 本书又同时盖有 2.9cm 九叠篆朱文粗边方印“国立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新闻馆图书室”，且其中 2 本此印在封二和内页第一页接缝处再次出现。唯一没有新闻馆图书室登录号数的一本《古代社会史》，封面有周谷城先生亲笔“谨赠此于复旦新闻馆图书室”并落款，加盖有 1.4cm 碧落篆朱文粗边方形姓名章，旁边有一个蓝色的 2.9cm 九叠篆朱文粗边方印“国立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新闻馆图书室”。可以推测，这 4 本书是在 1944 年，北碚校区在嘉陵江畔建成新闻系新闻馆至 1946 年学校迁回上海这两年间捐赠给新闻馆内设的图书室，而非图书馆。新闻系学生异常活跃，新闻馆的性质也不单单是一个学校组织，同时兼具了出版社和学术活动中心的功能 [10]。也许是和这个特殊的性质和新闻学的一些特点有关，这 4 本书中的 3 本，或在封面，或在扉页，都盖有一枚特殊的印章，未见于其他捐赠书籍。这是一枚 1.1*7.1cm 长方形印章，底部写有楷体繁体字“赠书”上方空格填写有捐赠人姓名，分别是“周谷城先生”（一级教授）、“孙问章”（新闻系 1938 级本科生）和“易鼎”，唯一没有此印的一本书在封面右侧写有“曾德镇会友捐赠”（新闻系 1941 级本科生）[11]。现在不管是新闻馆还是图书室都已经不存在了，图书室的藏书很可能是在迁回上海的过程中就并入了图书馆馆藏。但这些书上的印记，让本团队又重新考证到当年在艰苦的环境中，教授和已毕业的校友对母校的感情和贡献。





图 9 《俄国怎样打败了拿破仑》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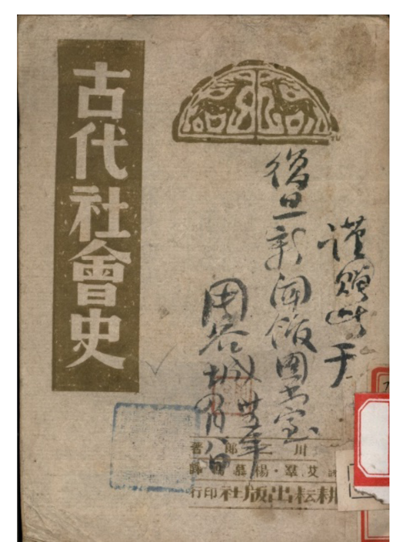


图 10《古代社会史》封面



图 11《古代社会史》扉页

5.3.2 发现馆藏价值

《留英须知》（见图 14），是目前所知的入藏复旦大学图书馆最早的藏书之一，它的出版信息中没有出版年份，登录号为 1200，判断其入藏年份在现在能查到的最早的登录簿之前，也就是民国 15 年以前。封面印有长方形 2*4.2cm 楷体“复旦大学 / 戊午阅书社”印佐证确实是非常早入藏的书籍，右下角又有一枚含有复旦校徽的圆形直径 3cm 繁体字“图书馆”和威妥玛式拼写的“FuhTan University Library”图章，这枚圆形图章又在内页中反复使用了 3 次。扉页上贴着 20 世纪 30 年代的期限表（见图

15）和封底的借书卡（见图 16）对应，左上角有长方形 3.4*1.5cm 繁体“复旦大学图书馆登录号数”印，应为 1924 年之后图书委员会成立后所制，沿用时间暂时没有足够数据。正文第一页（见图 18）左下角有一枚繁体字圆形直径 3.3cm“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图章，中心为缪篆“图书馆”，圆形上方正楷“复旦大学”，下方正楷“藏书”，这枚章多见于 1962 年清点过的书籍，和此页页眉处的一个红色无边简体字小印“62 点”通常成对出现，经过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和年份数据比对，目前认为是 1962-1963 年使用的馆藏章（详见后文：5.3.3 通过书籍研究馆藏章服役年代方法）。根据这些信息推理，这本书在戊午阅书社时期入藏，在 20 世纪 30 年代非常受读者欢迎，后来可能因为信息过期了无人问津，但是又在后来每次清点中被留了下来，现在成为复旦大学图书馆自身历史珍贵资料，也是研究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留学生情况的珍贵史料。这些出版信息以外的重要信息在 MARC 记录中都无法呈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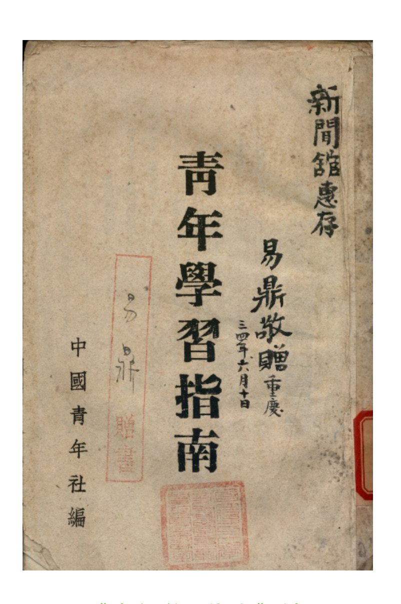


图 12《青年学习指南》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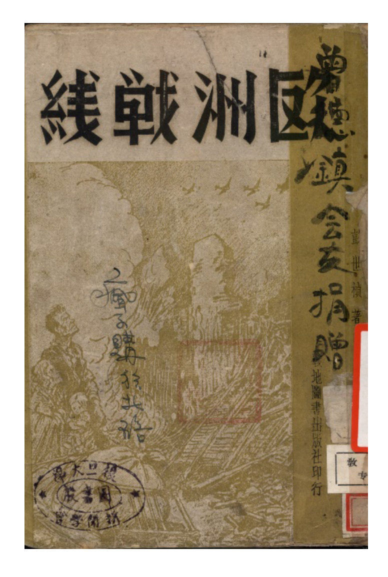


图 13《欧洲战线》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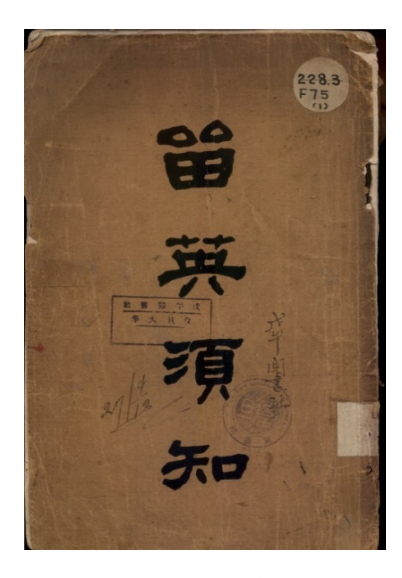


图 14《留英须知》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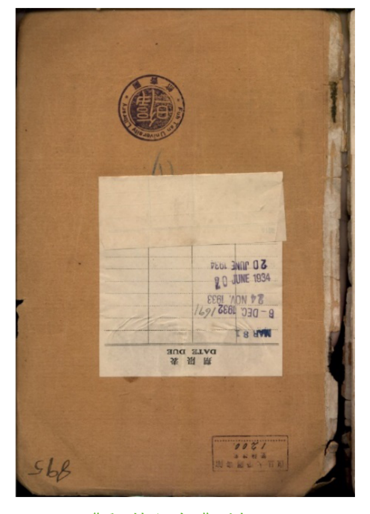


图 15《留英须知》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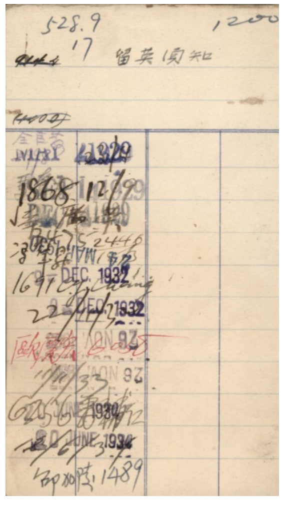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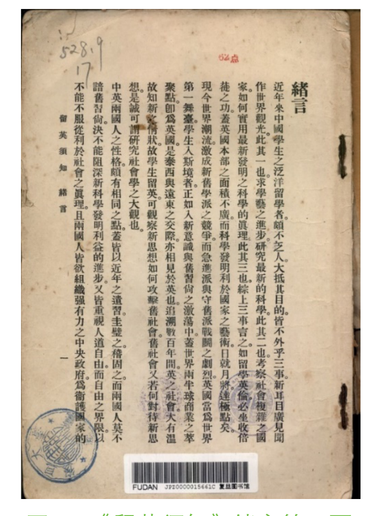


图 16《留英须知》借书卡



緒言

图 17《留英须知》绪言第一页

知识管理论坛，2019(4):232–245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25

5.3.3 通过书籍研究馆藏章服役年代方法

馆藏章的服役年代很多时候并无档案可寻，但通过多本馆藏的比对分析可以恢复很多馆藏章的服役时间记录。虽然通过章的文本已经能挖掘出很多特藏的附加信息，如带有“国立复旦大学”这个名称的就基本可以推定是抗战后期到建国前；带有各个院系、部、组等组织名称的，可以通过调阅各院系资料室、图书室的相关档案来判断。然而还有很多章只能通过收集的数据来反向研究，即通过整理书籍相关信息来推测书上章的年代、来历。如已发现的多枚“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印（见表 2），有朱文、白文、方的、长方的等，各式各样，楷体章还能大概通过是繁体还是简体字或是掺杂了两者来先大致判断其使用时期，篆体章则无法从文本判断。相对于正向的研究，个案分析工作比较枯燥，并且需要长期地大量收集数据进行分析。

将现阶段收集到的 71 个馆藏章和今后补全的每一个章逐一通过章自身文本与加盖此章的每一册书籍所有可以用于判断该印章年代的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对比，科学严谨地分析它的服役年限，从而得到可以在正向研究中使用的信息。

但是这次的数据样本不是随机抽样的：首先抽取出的书都是文科 7 楼书库中前 11 排书架上的，且集中在第 5-6 排书架，而排架又是根据索书号，也就是主题排的；其次，选择抽出的书也不是随机抽样，而是抱着“为备百年馆庆展收集展品”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加以选择的。在现阶段这些结论可能非常符合数据的描述，但是随着数据库的建立和研究方法的完善，现在的这些结论很有可能会被推翻，此处只是讲述一个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刚开始时，研究人员以为只需要抽样收集有本次初步尝试所要研究的 15 枚章所在单册的登录号并找到对应记录的年份，便可以轻易得到章的使用年代。实际操作后发现情况非常复杂，具体包括：①通常，每本馆藏图书都至少会加盖一枚复旦馆藏章，然而，想要短时间内在10万馆藏中收集馆藏章的使用数据，即使仅收集已知的 15 枚，也是非常困难的——有些章使用量大，有些使用量小。②馆藏章的加盖可能出现在入藏后的任何时间点。③登录号对应的年份并不完全可信。多次出现过一个登录号对应多个登录簿（也就是对应多个登录年份）的事件。

对于这些情况，研究者只能先无差别计算所有数据的相关性（见表 2）。相关性普遍非常之低，但即便如此还是有所发现。

表 3 本次使用图书数据样本综合分析

登录号年	册数	出版年	册数	索书号段	册数
-1926	2	1921	1	100	1
1934-39	4	1922	1	110	1
1938	15	1924	2	120	1
1939-43	6	1926	2	140	2
1951	17	1927	1	150	1
1952	3	1929	4	170	2
1953	1	1930	4	240	1
1955	19	1931	4	280	1
1956	5	1932	1	300	1
1959	6	1933	4	500	2
1963	9	1934	5	520	8
1971	1	1935	5	530	3
1974/75/79	2	1936	4	540	12
1980	1	1937	5	550	25
		1938	4	570	21
		1939	2	590	1
		1940	5	600	2
		1941	2	610	1
		1942	5	620	1
		1944	1	710	1
		1945	3	730	2
		1946	1	740	3
		1947	4	780	1
		1949	12	H30	2
		1950	4		
		1956	1		
		1962	1		
		1979	1		
总册数	110				
有馆藏章出现册数	98				



知识管理论坛
2019 年 第 4 期（总第 22 期）

前文提及的这枚“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圆章（见表 1 中的章 10），在第一批 110 册书中共有 58 本出现过，它们的登录号对应的入藏年份非常广泛——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初（见图 19），。在全部 110 册书中有 78% 的书都盖有“62 点”小印，反过来，所有有“62 点”小印的书上有 68% 都有这枚圆章。初步认定此章可能是 1962 年大清点时用于加盖在所有没有加盖本馆藏书章的藏书上，沿用至 1963 年。之所以认为 1962 年才有此章，是因为这枚圆章年代分布很广，但有其他馆藏章的登录号对应年份却在某时段很集中，且都在 1962 年以前——在全部有这枚圆章的 58 本书中，所有 1962 年以前入藏的书几乎都可以找到 1962 年被清点过的痕迹，但在 1963 年入藏书籍中就寥寥无几了，此后入藏的更是没有。计算两特征相关性，达 0.37，是目前所有印章中和 1962 年清点痕迹相关性最高的一枚（见表 3）。样本扩大一倍后（依然不随机抽取），关系系数数值变化不大，变为 0.4，隐隐有上升趋势，是现在所有数据分析结果中最可信的，但依然不排除未来被推翻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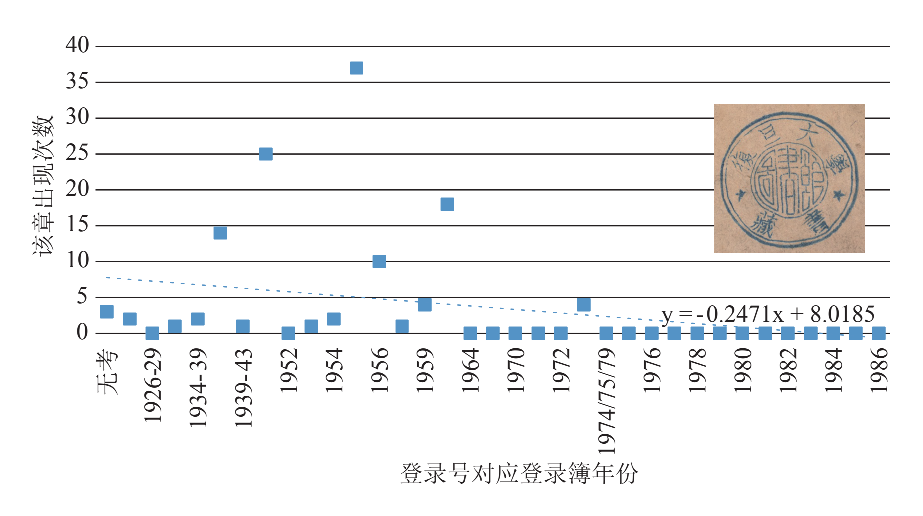


图 18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圆章出现书籍之登录号年份分布

表 4 相关系数表

章	章1	章2	章3	章4	章5	章6	章7	章8	章9	章10	章11	章12	章13	章14	章15
62点	0.12	0.11	-0.09	-0.11	0.06	**0.41**	-0.45	-0.14	-0.18	0.13	0.06	0.10	0.16	0.17	0.19
章1															
章2	0.13														
章3	-0.05	-0.02													
章4	-0.02	-0.01	-0.02												
章5	-0.02	-0.01	-0.01	-0.01											
章6	-0.17	-0.05	-0.23	-0.11	-0.07										
章7	-0.10	-0.05	-0.02	-0.04	-0.03	-0.45									
章8	-0.11	0.06	-0.02	-0.04	-0.03	-0.06	0.00								
章9	-0.04	-0.02	-0.03	-0.02	-0.01	-0.18	-0.07	-0.07							
章10	-0.05	-0.02	-0.04	-0.02	-0.01	0.08	-0.08	-0.08	-0.03						
章11	-0.02	**0.57**	-0.01	-0.01	0.00	-0.07	-0.03	-0.03	-0.01	-0.01					
章12	0.00	-0.03	**0.31**	-0.03	-0.02	-0.19	-0.11	-0.11	-0.04	-0.05	-0.02				
章13	**0.31**	0.13	-0.05	-0.02	-0.02	-0.06	-0.10	-0.11	-0.04	**0.35**	**0.26**	-0.07			
章14	0.03	-0.03	-0.05	-0.02	-0.02	**0.21**	-0.09	-0.10	-0.04	-0.04	-0.02	-0.06	-0.06		
章15	-0.05	-0.02	0.07	-0.02	-0.01	0.09	-0.08	-0.09	-0.03	0.08	-0.01	-0.06	-0.05	-0.05	
与登录号对应年份相关系数	-0.12	-0.33	-0.06	0.02	0.02	0.14	0.05	0.11	-0.34	-0.07	-0.29	-0.02	-0.03	-0.05	0.05
与索书号段相关系数	0.11	0.11	0.04	0.07	0.04	-0.06	0.00	-0.12	-0.12	0.05	0.04	0.16	0.19	-0.03	0.07
与出版年份相关系数	0.01	0.04	-0.02	0.03	0.02	0.00	0.03	0.04	0.06	-0.03	0.02	-0.12	0.01	-0.17	0.06

知识管理论坛，2019(4):232–245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25

6 藏书印记全面著录方案

本团队对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藏书印记的数据挖掘和分析尝试历时不到一年，也仅针对当前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总结，基于当前实践得出的结论也很可能随后续更多数据的加入而被推翻，但从方法上来看，基于藏书印记进行信息挖掘与分析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例如通过统计得到每枚馆藏章的使用年限在多数章上是可行的，并且可以通过计算多枚章的相关系数相互验证年份、传承关系等。

但是，如果此工作在样本数据基础上全面展开，需要对特藏印记全面回溯，构建完整的数据框架，并建立起合理的分析模型。如此可以为正向的分析研究提供数据基础，获得更可信的印鉴使用信息用以进行特藏信息的挖掘和著录，从而对其信息、历史、艺术等价值进行正确的分级，使得馆藏价值得以从各个侧面被揭示，也可以使馆员在日常保护、服务、扩充馆藏等工作中拥有足够的信息以做出更正确的判断。

如果要对鉴藏章进行描述控制，使之成为一个可统计的数据，需要尽快补齐和电子化所有特藏描述元数据。根据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在编目馆藏上的鉴藏章时所使用的细则，馆藏章 MARC 著录规则建议如下：

（1）藏书印记的著录顺序

线装书左开从第一页右下角第一个章开始向上向左编目；西式装帧图书右开从第一页左上角第一个章开始向下向右编目。

（2）著录字段定义

● 305 字段：登录鉴藏章命名。以释文 + 朱 / 白……+ 方 / 长……等描述命名。

如馆藏上仅有一枚章 7 的情况则登录为：305 $a 有“復旦 / 大學 / 圖書 / 館藏”朱方印。

如同时有章 7 和章 9 的情况则登录为：305 有“復旦 / 大學 / 圖書 / 館藏”朱方、“復旦大學 / 圖書館 / 藏書”阳圆印。

● 317 字段：陈述流传历史。

● 702 字段：记录鉴藏章涉及的过往收藏者（检索点）

与古籍相比，特藏书籍印记不完全适用，也不可直接照搬此细则，还应额外考虑以下若干问题：

（1）设计相近、印文相同的章如何区分？例如，按上述细则编目则会导致章 6 和章 7 描述相同，无法区分。

（2）305 字段无法作为检索点，并且由于每个章并不分开记录，如何确保数据可分析？

（3）如何加入每次流传时间的元数据？

为解决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以下规则，以期对全面回溯实践加以指导。

（1）全面收集并创建藏书印记数据库：赋予每个印章唯一 ID 号，用于后期区分以及数据抓取、分析。此数据库必备字段包括：ID 号（主键）、图例、释文、设计描述、档案记载该章 / 收藏者 / 机构活跃年限、数据分析年限（动态）。

（2）建立独立的特藏数据库，或在全馆统一的馆藏书目数据库中，记录单册印记信息并在所有回溯过的特藏 MARC 数据中添加有更多信息及获取提示。①在特藏数据库中为每个复本的印记逐条著录，并使用条码号作为与统一书目系统的链接点（主键）。②鉴藏章仅使用 ID 号登记，一方面减少数据量，方便检索；另一方面保证同一个章不会因为编目人员的主观原因被登记成为不同的两个章，提高工作容错率。③手记等印记如实转录全文，并描述其字体、位置。④描述每个单册品相（细则根据需要制定）。⑤设立记录根据单一馆藏自身档案记载 / 全部印记推测的每一个章的加盖时间，但并不展示数据，仅用于分析。

相关数据库关联关系如图 19 所示。

7 结语

复旦大学图书馆所面临的历史信息缺失问题在国内高校图书馆中普遍存在，而这些缺失的信息将造成特藏价值的误判，导致读者无法利用、错失国际交流的机会，甚至造成误剔除等重大损失，如有情况相仿的机构笔者所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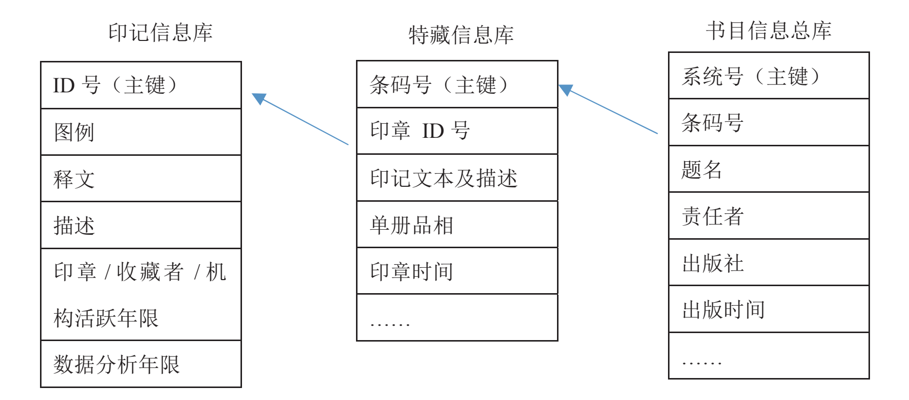


图 19 相关数据库关联关系示意图

法未尝不可一试。在各校建设“双一流”的大潮之下，各校特藏中的这些宝贵历史烙印是建设世界一流图书馆的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高校图书馆应该充分认识到回溯历史信息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笔者认为可以先从本馆历史着手，梳理、补充所有确定的线索，发掘馆藏章等其他可能但不确定的线索并收集数据用于分析。在合理的工作规划下，较小规模的特藏完全可以利用本馆现有管理系统配合 Excel 或 Access 等常用办公软件实现前期甚至全部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参考文献：

[1] BERGER S E.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M]. Chicaco: Neal-Schuman, 2014.
[2] 沙孟海 . 印学史 [M]. 上海 : 上海书画出版社 , 2017.
[3] 安嘉清 . 从藏书票与藏书章谈中外收藏艺术文化 [J]. 电影评介 , 2012(11):84-85.
[4] 王延红 . 论古籍藏书章整理的意义 [J]. 图书馆论坛 , 2005(5):214-215.
[5] 陈振濂 . 篆刻艺术学通论 [M]. 上海 : 上海书画出版社 , 2017.
[6] 毛瑞江 . 特藏文献中的“流传印记”及其编目 [J]. 大学图书馆学报 , 2015, 33(4):24-28.
[7] 赵书城 , 王勇 , 万振新 . 从藏书章的变化看兰州大学图书馆的发展 [J]. 兰州大学学报 , 2001(1):151-156.
[8] 姚淑萍 . 朱砂传承文化 印鉴见证历史——北京交通大学藏书章考 [J]. 北京档案 , 2013(3):48-50.
[9] 钱京娅, 史卫华 . 复旦大学图书馆百年纪事(1918-2018)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18.
[10] 复旦大学校志编写组 . 复旦大学志 [M].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1985.
[11]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 校友名单：1929-1949 [EB/OL]. [2019-03-10].http://www.xwxy.fudan.edu.cn/node2/fdxwxy/xyjr/node859/userobject1ai101685.html.

知识管理论坛，2019(4):232-245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19.025

Research on Special Collection information Mining based on Collection Mark Information: Taking Fudan University Library as an Example

Li Yanlin
Fudan University Librar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n essential part of special collections department's work is to routinely update metadata that is unique to special collections: Paper, Printing, Genre, Binding and Provenance Evidence, etc. Librarians can frequently encounter books with an only vague recording of its history before collected into the repository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case of collecting, analyzing and utilizing the stamp and signature information of single volume and books in Fudan University Library. In addition, the data mining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stamp and signature without records. **[Result/conclusion]** Through small sample tests, the researcher has proved the attempt successful using sample data. The basic designing of the database and work process is also illustrated.

Keywords: special collections building　provenance information retrieving　ownership stamps　library stamps　data analyze